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郭双林
高波
编

高一涵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郭双林
高波
编

高一涵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高一涵卷/郭双林, 高波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0-20355-3

I. ①中… II. ①郭… ②高…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高一涵(1885~1968)-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45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高一涵卷

郭双林 高波 编

Gao Yiha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41.25 插页 2	定 价	98.00 元
字 数	666 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在新文化运动诸贤中，高一涵的身后可谓最为寂寞。近百年来，新文化运动研究蔚为大观，几可谓巨细无遗、穷罗殆尽，然高一涵作为《新青年》（特别是早期）、《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的重要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密友，受到的关注与其地位却极不相称——不仅专著欠缺、论文寥寥，连基本的史料整理也只是在近十年来刚刚开始。这或许跟高一涵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步入政界、与时代思潮渐行渐远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仍在中国近百年来时代变革剧烈，代际间历史记忆往往多有断裂，致使许多引领一时的人物转瞬间便沉入历史暗夜。有感于此，即本“知人论世”之意，将高一涵置于晚清到民国的大变局中，略述其生平与思想（侧重前半段），俾读者诸君在阅读其作品前，对其人其言有所了解。



高一涵，1885 年 4 月 4 日出生于安徽六安，为家中第四子，名永灏，字效梁，一涵为其号。父兄皆习举业，然皆科场蹉跎，老大无成。高一涵幼年时，家境尚属小康，他由长兄发蒙，聪颖善读，少年时便在乡里以能诗善文名，故父兄皆寄以科甲之望。高一涵亦不负所望，至迟于 1902 年（十八岁）已中秀才。但此时已是清末新政时期，举国以学西洋、求富强为务，科举几成新派集矢之的，以为弱亡中国皆此物，必废之而后可。1905 年，科举正式被废，高一涵及其父兄的科甲之梦就此破灭。不过，二十岁之前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他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正如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显现出过

渡时代的两歧性——不管如何“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①。

取代科举的是西式学堂与留学教育，高一涵迅速对此潮流作出回应。1906年，他入六安州中学堂，改学西学，此亦为其离乡之始。高一涵在该学堂成绩颇佳，1908年，经县府选送，他又考取安徽高等学堂（同学有王星拱、邵逸周、程振钧、俞希禹等）。安徽地近江浙，风气开通，他在此一时期接触到了严复的译著与梁启超的政论，甚至还有《民报》这种革命派的宣传品，被新式的民族国家与共和政治理想所触动。另外，1907年7月，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清廷酷刑处死。高一涵同乡好友朱蕴山亦受牵连，几乎丧命。此事令他颇受刺激，对清廷日益不满。

1911年，高一涵于安徽高等学堂预科毕业，随后任职于安徽省民政司。同年，武昌起义爆发，安徽在10月末亦有革命党起事，历时约一月，成功光复全省。我们虽不知道高一涵在此期间有何作为，但从他之后的思想来看，他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对于共和革命当是乐见其成。

1912年，革命以南北议和的方式解决，共和理想表面上得以实现，令时人感到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解决所有问题，民气勃然而起。在此气氛下，更富理想色彩的新派青年觉万事可为，多不安于位，纷纷另寻新路，高一涵亦不例外。该年，他未禀明家人便东渡日本留学。此时其家道已中落，故不能供应以学费，他或向友人告助，或以鬻文自给，坚持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直至1916年7月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至此时，他受西学熏染已逾十载，所习又为此时最为流行的法政之学，其一生学问事业皆以政治学为主干，根基正奠定于此一时期。

留学生涯对高一涵一生学问事业另有一重大影响——他由此成为留日生与革命者群体中人。自清末新政以来，此一辈人渐已执国内文化界之牛耳（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才被留美生所取代），王汎森所论“天才总是成群地来”，于此即为一例。二次革命失败后，南方革命派多流亡日本，高一涵得与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相交，皆为一生之谊。此时的

^① 傅斯年语，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1929年4月27日条，40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破毁共和，又对南方革命派的激烈政治行动有所保留，更认同的是章士钊等人的调和主义。因此厕身于前期“甲寅派”之列，成为章士钊麾下的三剑客之一（另两位是李大钊和李剑农），也就此登上中国近代思想与言论界的舞台。

二

“甲寅派”以章士钊为首，以《甲寅杂志》为喉舌，主张重振共和主义。该群体既愤袁世凯破毁国会、践踏宪法，又不满党人跋扈、以民国为己有，试图在两者间探索中道，以使共和政治步入正轨。其政治资源多借自维多利亚时代英伦诸贤（戴雪、白芝浩等），重视自由过于民主，以不“好同恶异”为号召，实为颇具精英气质的共和主义。其文体亦自成一格，“注重论理，注重文法，既能谨严，又颇能委婉”，号称“甲寅体”，实为“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①，可谓“新民体”与白话文间的过渡，其思想亦然。

对此种文体，深谙古文义法的高一涵驾轻就熟，文字的典雅也并未妨碍其思想表达的明晰。他此时的主张为契约国家论，其论国家曰：“国家者何？自由人民，以协意结为政治团体，藉分功通力，鼓舞群伦，使充其本然之能，收所欲祈之果，及以自智自力，谋充各得其所之境者也。国家、人民，以性质言，则无二体；以权利言，则互相对待。”他主张人民有对抗政府的权利，并视此权利为欧美文明根本所在以及中西分途之点——“欧美文明，所以不虞退转，迥异吾国史中盛衰兴亡之陈迹若轩然大波、突起突落者，此殆其最大原因欤！”^②他既以权利为政治的基础、民权为民福的前提，故力主两权，一为个人的人权（集会、言论、财产权等），另一为人民的参政权，并释后者为选举代议士之权，如此则代议政治为现代国家必须之物，与人民主权实为一体。

此实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伦诸贤的共同观念。彼等面对选举权扩大与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新局面，主张自由与平等一致，力图调和古典自由主义与卢梭派的人民主权论。高一涵对此点笃信不疑，认为民主国家与个人自由绝无矛盾，故其一面对卢梭再三致意，另一面对洛克、密

^① 胡适：《五十年以来中国之文学》（1923年2月），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201、2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 高一涵：《民福》，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2～3页。

尔一系亦赞赏不已。其背后的信念，则为政体进化论。他认为政治有古今之别，相较古代国家，现代国家已成功超越治乱循环，进入一治不乱的新境界^①，而洛克、卢梭与密尔不过是达至这一境界的各级进化阶梯。

既汲汲于进化主义与共和主义，则不可不致意于世界主义。高一涵认为中国的政治选择，必须依世界思潮之趋向为准的。他认为只有古今问题，而无中西问题，东海西海，一依进化之理。故其以研究西洋政治思想为己任，而殊不觉与中国问题隔阂。其目标则为以理想变政治。他认为：“政治本由理想产出。理想者，为事实所感召，立之以纲维时会之迁流者也。必有新理想导之于先，乃有新政治实现于后。”另伴以后进国知识分子的赶超意识，认为“政治进化，非同机械；发达变迁，均为有意识之动作。凡他国由枉道而得之利益，吾可由直道而得之……由此以推，则凡先进国回环顿挫、历数世纪始获得之进步，后进国可寻得捷径，而于一世纪之中追及之。然则述西人政治思想之变迁，以为吾国政治思想变迁之引导，诚为今日之急务焉”^②。此处“述西人政治思想之变迁，以为吾国政治思想变迁之引导”一句，最可见其立身抱负所在。具体言之，“大抵文化初开之时，多以政例肇政理。故有尧、舜、禹、汤之政治，而后孔、孟之政论乃大明。至文明大启之秋，则常以政理启政例。故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说，为近世宪政之精神；卢梭之平等自由论，遂唤起法国之革命”^③。其以政论家自命，盖有深意存焉。

如此则不可不注意教育问题。1916年至1917年，复辟派与共和派激烈交锋，前者每以人民程度不足为辞，高一涵则为文力证其非。他的主张颇似希腊先贤，以政治为教育人民的最好学校，认为“专制政治孺稚万民，助长其依赖之性；平民政治尊重人格，长养其自立之风”。“然则图政治之进程，增国民之政识，舍民政而外，其道奚由？”故“果见吾国大患在程度不足，正应药之以共和，补之以民政”^④。这种共和教育论亦有几分合于中国以政为教的传统。高一涵投身舆论与大学，似亦

① 参见高一涵：《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2页。

②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1页。

③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7页。

④ 高一涵：《程度与民政》，载《民彝》第1期（1916年5月15日），2~3页。

与此种理念有关。

但现实政治与高一涵的理念大相径庭。辛亥革命后，中国共和政治抗攘不堪，革命与复辟交替，俨然 19 世纪法兰西革命再现。英伦政治既不可得，高一涵唯有等而下之，求以法律稍增文治，抑制民元后黷武主义与地方分裂之势。他认为：“自政治通例言之，一言武力，则莫不与立宪政治彻底相反。”^① 其视新生共和为无上财富，痛切陈言曰：“至约法，则以革命流血而得之，复以革命流血而复之，行之者数年，争之者数次。约法一坏，国本尽摇……暴动一次，根本大法推翻一次，认暴动为有宪法上之权利，则谁能暴动，谁即享有废宪创宪之权。若而，国家必终古在云翻雨覆之天，法律安有固定之望？……此吾人所以不得不深恶痛绝之者也。”^② 故力促调和，尤主新派内部国民、进步两党必当调和。然其所瞩望，不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与 1875 年宪法，聊为弥缝补苴而已。

但 1917 年后，南北分裂，国家陷于内战，前期“甲寅派”的论政基础已被破坏无遗。既失此基础，则诸人各自星散，别寻途径以拯救共和，亦为自然之事。“新青年派”则正式浮出水面（高一涵为其中重要一员）。此一批留日法政学者趋向革命，实可为时代转向激进之象征。盖习法律者富理性而多保守，由法政而入革命，实为最远路线。其思想轨迹，深可玩味。

1916 年夏，高一涵自日本归国，不久北上，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会合。一年之前，陈独秀从日本归国，有感于共和已经失败，必须别寻基础，故创办了后来鼎鼎大名的《新青年》（最初名为《青年杂志》），转向为青年人立言。将毕虽巨，作始却简，刚刚创办的《青年杂志》籍籍无名，销路不畅，大半靠陈独秀的人脉维持。作为安徽老乡，又在留日时期颇有过从，重兴共和的理念亦复相似，高一涵自然责无旁贷，在《新青年》创办的头三年中，他几乎是除陈独秀之外最为勤勉的撰稿人（发表文章十余篇）——也正是这些文章奠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高一涵的思想演进中，有一“甲寅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区分，然两者间殊乏明确分界点。概思想演变如移步换影，拖泥带水

^① 高一涵：《论欲实行立宪政治者应有之觉悟》，载《甲寅日刊》第 144 号（1917 年 6 月 13 日）。

^② 高一涵：《收拾时局之商榷》，载《甲寅日刊》第 141 号（1917 年 6 月 10 日）。

远多于一刀两断。然若仅就高一涵自身心态而论，则1917年可谓两者转换之期。他在年初便发出宣言，主张“往岁之革命为形式，今岁之革命在精神。政治制度之革命，国人已明知而实行之矣。惟政治精神与教育主义之革命，国人犹未能实行。实行之期，其自一九一七年始”^①。此种重新开始的心态，提示着思想转换的可能性。

但作为法政学者，其思想转换脉络，仍在法政之学内部。首在反思国家主义。高一涵认为“国家非人生之归宿”，以此反对“国家万能主义”，矫正辛亥革命政治万能之弊。此一讨论背后之主题，为“国家趋向”问题，他明确反对道德国家论，对权利国家说亦持保留态度，认为：“无人民不成国家，无权利不成人民，无自由不成权利。自由、权利、国家，均非人生之归宿，均不过凭之藉之，以达吾归宿之所耳。”^②视权利亦非人生归宿，隐然已有超越英国宪政论之意。

既以人生归宿不在国家，而“国家者，以人生之归宿为归宿者也”^③，则从政治趋向文化自为应然之理。高一涵反思辛亥以来中国连番政治挫折，认为政治变革不能自足，必要进到文化层面方可，因为“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④。具体言之，则必当有新道德、新伦理，然后方能有新政治。

政治本乎道德，乃古今论政者之通识。但高一涵与古人终究不同，他以进化论为道德基础，认为“道德者本诸学理，应诸时势，根诸人心，乃因时转移之物，而非一成不变者也。道德而不适时势之用，则须从根本改造之，无所惜也”^⑤。此种道德相对主义的见解，易于一变而为道德革命的主张。他又以为此时为民主时代，新道德当以平等为基础，求平等，则舍自由莫由，而“自由之界，随文化之演进而弥宽，文

① 高一涵：《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1页。

② 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7页。

③ 高一涵：《乐利主义与人生》，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6页。

④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551页。

⑤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3~4页。

化愈高，斯自由愈广”^①。然则高一涵认为，自由与平等的一致性在于道德，非自由无以造成平等的新道德。

高一涵认为，新道德以自利利他为标的，而“所谓自利利他主义，必以小己主义为始基”。此一理念为自由主义者所共有，然内中却有一大难题，即个人权利论似不足以外推而成社会道德。故高一涵更进一步，释此种小己主义为发挥个性，试图以人格论而非权利论作为新道德的基础。故其论自治与自由，则曰：“以我克我曰自治，不以他克我曰自由。”“自由乃自治之归宿，自治实自由之途径，二者常相得相用，而不可相离。”^②此实隐有以自由改造个人之意，故高一涵一反“甲寅时期”，重新肯定法国大革命，认为其真价值不在政治革命，而在个人革命。

此不仅为个人革命，亦为代际革命。《新青年》以为老年受传统浸染已深，不可救药；政治的希望则在舆论，舆论的希望则在青年，故转向为青年人立言。即“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俾之脱胎换骨，涤荡其染于专制时代之余毒，他者吾无望矣，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觉，此不佞之所以专对我菁菁茁茁之青年而一陈其忠告也”^③。

青年处于未定态，最关心人生问题。高一涵既视政治本于人生，而人生本于理想，则不可不由谈政治进而为谈人生，再进而为谈理想。然其所举理想，则一洗道德主义气味，为“乐利主义”。其辞曰：“凡恶皆苦也，即不然，亦为召苦之因；凡善皆乐也，即不然，亦为致乐之兆。”^④此为边沁式功利主义，以苦乐代善恶。以此为衡，认使人入于苦境者为“伪德”，将共和问题变为人生与人性问题，则已现道德革命意味。

然高一涵并未弃政治而去。他失望于民初代议政治，转而寄望于舆论，又进而寄望于各群体自治（从学生到商人不一而足），仍是要将政治的基础从议场内移到议场外。故在1918年后，他又似从虚玄的文化进到实体性的社会——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故个人革命与道德革命终究要以社会革命为前提，具体说来，“要想在日日所见的小事上着眼，

①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5页。

② 高一涵：《自治与自由》，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1、4页。

③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1页。

④ 高一涵：《乐利主义与人生》，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2页。

要想使人不满意于社会现状，不要为社会现状所同化，要想使人立在社会外看社会，不要钻到社会中为那社会融化了”^①。由政治而文化，又由文化而社会，其内在理路为何？几年后，他作出解释：“个人是社会文明的创造品，文明又是社会的创造品。”^②然则个人必当为文明、为社会尽责任，而“人类必定生在国家团体之内，才可以遂他生存的目的”^③。如此则个人、文化、社会与国家实为一体。故其背后关怀，仍在政治，即“做社会运动，就是做政治运动，做社会事业，也就是做政治事业。政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这就是如今新式的共和国家”^④。新文化运动与民初共和政治的连续性，也于此可见。

三

1918年，高一涵进入北京大学，任职于编译委员会，同时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此时陈独秀与《新青年》亦北来，胡适亦已归国，以留日生与留美生为主的北大—《新青年》团体正式形成。而新文化运动在学生中影响亦日增，至次年五四运动前夕，已有蔚然成潮之势。

此一时期也是高一涵一生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五四运动后的一大趋势，即为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兴起，“社会”迅速取代“文化”，成为思想与言论界的中心词汇。高一涵亦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多有关注与介绍。他一度对无政府主义颇为倾心，撰文介绍老子、克鲁泡特金等古今中西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他认为：“从积极方面看，无治制度就是‘自治’（self government）的意思”，“凡主张拿自己的能力自由解决自己的一切行为，不靠强力胁迫的政府，专靠自由结合的社会，这种学说叫做无治主义”。他虽声明要谨守学者立场，不下一个字的判断，不表示一点自己的见解，“至于无治主义究竟是好是坏，我个人的意思究竟是赞成他是反对他，一个字也不提，好让看的人自由去下裁判罢”，

① 高一涵：《皖江见闻记》，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404页。

② 高一涵：《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载《晨光》第1卷第1号（1922年5月30日），8页。

③ 高一涵：《女子参政问题》，载《晨光》第1卷第2号（1922年8月15日），6页。

④ 高一涵：《欢迎中山先生脱离军政府》，载《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2版。